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2003/WG.18/2  
9 December 200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发展权问题不成员名额工作组

2003年2月3日至14日，日内瓦

发展权问题独立专家阿尔琼·桑古塔先生根据委员会  
第2001/9号和2002/69号决议就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  
对享有人权的影响问题提交的初步研究报告

###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内容提要.....		2
导 言.....	1 - 2	3
一、发展权的必要性 .....	3 - 7	3
二、全球化和发展权 .....	8 - 20	5
三、国际援助、贸易自由化和发展权 .....	21 - 27	9
四、全球化经济环境中的发展政策.....	28 - 37	11
五、结论和建议.....	38 - 48	14

## 内 容 提 要

这是发展权问题独立专家的初步研究报告，目的是阐明国际经济问题对实现发展权的影响。鉴于如他以前的报告所述发展权的必要性，本报告研究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的主要特征及其如何与实现发展权过程相联系的问题。本报告简要论述了国际援助和贸易自由化的性质及其在多大程度上实际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要求，特别是在它们争取实现发展权时。在这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对减贫和实现发展权问题采取的综合政策的影响，然后就以前的报告所阐述的执行发展权模式——发展协约提出了结论和建议。

全球化原则上能够将享有商品和服务的机会扩大到一个国家本身能够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范围之外。它可能会提高一个国家内个人享有发展权的能力。但实际上，本报告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后，总的来说并没有改善享有发展权的情况。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并非总是引起经济增长，而在发生经济增长的地方，也并没有因此而使平等和社会正义有所改善，也并非总能实现减贫的。为了将这种潜力转化成实际能力，一个国家必须采取一整套适当的政策，将全球经济提供的机会与有助于它实现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发展政策结合起来。从发展权的角度处理政策规划与全球化并不抵触，相反，能使全球化有助于实现发展的基本目标。本报告概述为了使国际经济环境更加有助于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而必须要克服的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障碍。它表明有必要审视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贸易安排，包括争端解决机制的运作情况，以便使贸易和自由化政策能够实现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过程。

## 导 言

1. 这是发展权问题独立专家为阐明国际经济问题对实现发展权的影响而编写的初步研究报告。提交本报告，是为了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1/9 和 2002/69 号决议(第 7 段)供工作组审议。

2. 根据独立专家以前的报告，第一节概述发展权的必要性。第二节阐述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的主要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与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方面可制定的指标的关系。第三节简要论述国际援助和贸易自由化的性质及其实际上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要求，特别是在它们争取实现发展权时。第四节讨论发展中国家在减贫和实现发展权方面愿意采取的综合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后，第五节就独立专家以前的报告阐述的用发展协约落实发展权模式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 一、发展权的必要性

3. 独立专家在以前的报告中详细研究了发展权的范围和内容。<sup>1</sup> 发展权被明确为能充分实现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具体发展过程。这是一个逐步实现所有权利、落实实现这些权利的发展政策以及通过经济增长放松对这些权利的资源限制的过程。必须将对这一过程的权利看作一种综合权利，实现这一权利就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地实现所有权利。<sup>2</sup> 这些权利的一体性意味着，如果其中任何一项权利遭到侵犯，发展权这一综合权利也受到侵犯。独立专家将这描述为改善人权的“矢量”，这项人权“矢量”由构成发展权的不同权利组成。实现发展权意味着改善这一矢量，以便使其中某些权利，至少一种权利得到改善，而其他任何权利又不因此而受到侵犯。此外，矢量的改善只能随着通过符合人权准则的经济增长逐渐放松对改善的资源限制而循序渐进地进行。<sup>3</sup> 因此，发展权不仅是对发展结果，即加强实现各种人权的要求，而且还是取得这些结果的过程。

4. 实际上，实现发展权作为与以权利为基础的经济增长一起分阶段实现各种权利的过程，将取决于担负责任者通过采取适当政策履行义务的情况。这些政策的目标是实现这些作为组成部分的权利，从而以适当的宏观政策协调具体的部门政策。如《发展权利宣言》所示，担负责任者主要是国家，它们必须得到具有相

应义务的国际社会、国际机构、双边捐助者、其他政府和多国公司的支持。国家必须制定和设计这种发展政策并根据不歧视和参与、负责任和透明地平等分享利益的人权标准予以落实。国际社会必须与各国合作，使它们能够执行这些政策。<sup>4</sup> 以上是为了尽可能扩大实现发展权的机会而设计的行为义务，它们必须得到所有方面的履行。<sup>5</sup> 由于在政策与结果之间没有完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因此履行行为的义务不会肯定导致履行结果的义务。政策，即使尽了最大努力，也会因始料不及的情况和不明确的变化而未能产生充分的结果，特别是当结果涉及的不是避免侵犯，而是履行积极权利时。但是，如果某项权利被认为是合法要求，国家和国际社会则有义务采取表明最有可能产生满足要求的结果的政策，从而履行相应的行为义务。权利拥有者可以作为“元权利”要求采取这种政策，使缔约国负责对不采取这些政策提供适当的补救，并使国际社会负责与它们合作落实这些政策。元权利的合理性来自期待担负责任者履行的权利，但它们完全可以象其他权利一样作为应得的权利来要求。<sup>6</sup>

5.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国际发展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制定和执行实现发展权的政策的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如何。发展权实现过程的特点以及这些努力的成败可以与所有这些权利汇集在一起予以分析，更具体地说是着重于根除贫穷的这一剥夺人权的最恶劣形式的政策以及经济变化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福祉可以他们的收入和消费及其反映在获得食物、教育、保健、住房、工作等方面的能力来衡量。本报告讨论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负有落实发展权主要责任的国家如何能够执行减贫政策和提高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基本能力的问题。

6. 正如个人参加扩大的市场那样，全球化原则上能够扩大享有商品和服务的机会，获得本国所不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从而能够提高享有发展权的能力。但实际上，如本报告所分析，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这样做。要将潜在的机会转变成实际能力，国家必须要采取一系列适当的政策。

7. 从实现发展权角度看问题就是要通过将国家经济与全球经济相结合获得的机会与发展政策结合起来，这种政策要使国家能实现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平等公正地实现经济增长，以根除贫穷、扫除文盲、解决营养不良和健康状况差等问题，保护社会上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只是向全球贸易和投资开放不可能实现

这一目标的，这种开放也不能是发展政策的唯一目标。必须采取更多有远见、妥善制定和有适当目标的政策，这种政策应有助于利用全球化的机会，有助于提高本国企业家的积极性和本国内劳动人口的生产力。国家必须在市场经济的形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基于市场提高积极性和生产力的过程中产生的机会只会有助于制定和执行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政策。也许有必要适当安排这种政策各部分的顺序，适当调整开放的速度，局外调节各种市场力量的运作并进行有效干预，必要情况下，如果市场不能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则由政府予以提供。从发展权的角度看待发展政策并不与全球化抵触，而恰恰是为了使全球化有助于实现这些基本的发展目标。

## 二、全球化和发展权

8. 全球化本质上就是各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1970 年代石油危机后的 25 年里，这一过程加快了，在这期间，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工业国和国际组织的交往有了显著增加。这种交往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使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造成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决策方面的自主能力严重削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政策制订方面主权国家在通过和执行政策前不得不考虑到其他国家可能作出的反应，特别是贸易伙伴的反应。但是，在当前全球化加速的阶段，只要预计到强烈的不良反应，就完全可能使发起国改变或放弃它的政策。

9. 显著促进国家间相互作用的两个最主要因素是：第一，运输、通信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使交易成本降低；第二，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障碍的减少。这表现在贸易总流量(进出口之和)自 1980 年以来占低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以及对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幅度增加。虽然总的来说，各国与自己过去的记录相比，绩效有很大的变化，但在这一时期，这些指数显著提高。<sup>7</sup>

10. 但是，资本流动或资源转移方面的统计比较模糊。一些发展中国家积极参加激增的国际贷款，证券、公债和衍生债券的二级市场交易以及全球外汇交易，因而流向它们的资本流量总额显著增加。但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的数据所示，与 1970 年代末相比，1990 年代的平均资本净流入额没有发生多

大变化，表明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源转移没有大幅度增加。此外在这一时期，它们的资本流量组成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官方资金流量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总额中所占份额从 1980 年代的 50% 以上急剧减少到 1990 年代的 20%，但私人资本流量却有所增加，因而抵消了官方资金的下降。官方资金大多流入发展中穷国，而私人资本流量则集中于一些特定发展中国家。1990 年代期间，只是 20 个国家就接收了私人资本流入净额中的 90% 以上，而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只占 50%。<sup>8</sup> 伴随着全球化过程的加速而出现的国际资金流量激增，实际上忽略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尽管外贸进出口扩张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对它们发挥了一些作用。

11. 要直接评估这种全球化对这些发展中国家享有发展权的影响，不是容易的。发展权的指标应该是对应于各种权利的商品和服务的供应指标以及基于权利(平等、不歧视、以参与、负责和透明等方式)获得这些商品和服务的适当指标的组合。也许不宜制定获得这些商品和服务的适当指标，但供应方面的指标可以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人的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获得。实际上，可以将享有发展权定义为享有符合人权标准的人的发展。因此，至少可以说，如果全球化要对发展权产生积极影响，它与人的发展指数(人发指数)或人发指数的组成指标的关系就应该是正比关系。可惜的是还不能确立任何这种相互关系。用整个贸易——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代替一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指标，结果是关系不明显。

12. 将融入世界经济的情况与贫穷方面的指标联系起来，也许是评估融入情况对发展权影响的另一条途径。鉴于贫穷是一种违反人权的情况，因此可以将减贫方面的指标用作实现发展权程度的指标。此外，这种影响的统计极其模糊。对有些国家来说，在这一全球化加速的时期，贸易——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等等的融入指标的改善是由于以收入计的贫穷指标有所下降。但这种关联并不普遍，减贫对收入增加的反应的弹性并不稳定。<sup>9</sup> 显而易见，若干指标在合力发挥作用，不能将它们的影响孤立于国际融入的影响之外。此外，如果以享有获得保健、教育、住房等等的权利的能力或者享有情况来测量贫穷，则不能确立这种关联。

13. 如果全球化导致经济增长，如果收入分配没有严重恶化，那么全球化就会直接有助于减轻收入贫穷(即生活在最低收入水平以下的人数)。但加强融入全球经济是否一定会自然地导致经济增长？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回答都是“不”。当

然，理论上有一种肯定的假设，即融入程度越大，增长水平越高。融入全球经济的国家在生产机会和消费机会这两方面均会扩张，竞争力提高，则效率提高，生产率提高，则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引起技术进步，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扩大出口而重置资源，所获得的净态效率收益可以用于进口更多更便宜的商品，特别是本国不必生产但能转换成动态收益、提高增长率的资本货物。但即使在理论界，也不会一定自然而然地产生上述任何结果，除非竞争平衡的假设能在实际上适用，但这种假设的局限性往往很强。我们最多可以说，如果提出适当政策，国家加强融入全球经济，很可能会产生上述结果。<sup>10</sup>

14. 实际上，从经验上很难确定，提高全球化的程度必然会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贸易——国内生产总值的高比率等指示数字常常是因为一个国家总体经济绩效的提高，是同时执行若干政策的结果，并非都是由于经济开放或者执行了贸易自由化政策。如 Dani Rodrik 所述，根据实际的开放政策，如降低一个国家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平均程度所作的研究并不表明与经济增长率有任何系统的正比关系。实际上，多达 42 个发展中国家，其中 12 个在拉丁美洲，6 个在中东和北非，15 个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尽管在实行高保护壁垒的同时又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但在 1973 年石油震荡前的数年内，它们的人均(伴随着很高的人口增长率)增长率仍然在 2.5% 以上。这些保护政策的效率极其低下，但即使在若干行业造成负增长，也不能抵消在受保护的环境中增加投资对这些经济体的增长产生的影响。<sup>11</sup>

15. Sachs 和 Warner 对开放或融入世界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比关系的研究<sup>12</sup> 最有影响力，它们表明，开放经济体的年增长率比封闭经济体高 2.4 个百分点，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但这些开放经济体除了减少贸易壁垒和调整汇率以外，还在采取另外一些政策，如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和地点优势等。继 Sachs 和 Warner 的研究后又一些重要研究证实了补充政策的这种影响力。Sebastian Edward 在一项极其全面的研究中使用 93 个国家的数据和九种不同的开放指数，得出结论，开放程度越大，经济增长率越高，因为贸易扩大，迫使国内生产商提高竞争力，吸收和开发新技术，这一切都要求采取支持性的补充政策。<sup>13</sup>

16. Dani Rodrik 对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经验性关系的证据作了如下确切的概述：

“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拒绝国际贸易和长期资本流动而发展成功的。外贸在国民产值中所占份额没有增加而实现长期增长的国家极少……。但同样也没有任何国家只靠开放外贸和投资而获得发展的。成功的诀窍是将世界市场提供的机会与国内投资和体制建设战略结合起来，以激发本国企业家的活力。”<sup>14</sup>

17. 关于收入分配问题，利用对不同国家一定时期家庭收入水平的调查进行的一些研究表明，作为分配指标的基尼系数较稳定，变化不大。<sup>15</sup> 因此，随着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增加，其穷人的收入也应增加，从而使其中一些穷人脱贫。然而，有些研究对这种关系的经验根据提出质疑，特别是根据最近几十年的全球化情况提出质疑。对有些国家，由于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采取的不同具体政策，不是经济增长没有随着融入的扩大而加速，就收入不平等更加严重，贫困率上升。

18. Cornia 作了一次综合研究，<sup>16</sup> 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标准对占世界人口 82% 和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95% 的 77 个国家从 1950 年代至 1990 年代的收入趋势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从而对全球化会提高增长率的判断以及基尼系数，即收入分配的稳定性提出了质疑。与 1950 年至 1973 年时期相比较，对多数国家来说，与最近 20 年的全球化相联系的，是增长放慢，不平等增加。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在 1950 年代至 1973 年期间约为 5%，但在以后的全球化年代里却下降到显著低于这一数字。在 1973 年前，约 42 个国家的人均增长率高于 2.5%。在以后的十年里，只有约 12 个国家保持了这一速度。中东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总要素生产率在前一阶段期显著增长，但后一阶段普遍开始负增长。在全球化初期，非洲南撒哈拉地区的 15 个国家人均增长率为 2.5% 以上。实际上，从这一时期一直到 1980 年代初，6 个南撒哈拉国家属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随后，这些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持续出现负增长，其中只有少数国家到 1990 年代末出现上升趋势。

19. 与 1970 年代中以前的时期相比较，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加速时期的收入分配情况恶化了。例如，从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甚至直到 1970 年代大部分时期，由于失业率稳步下降，收入稳定和社会保障扩大，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各国的不平等情况稳步减少。从 1970 年代末以来，这种趋势开始逆转，首先是在美国、联合王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然后逐渐蔓延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

荷兰和意大利。法国和芬兰出现了不上不下的趋势。从 1989 年以来，前苏联的不平等情况急剧上升，中欧的不平等情况上升较缓慢。拉丁美洲的基尼系数历来是世界上最高的，但在 1970 年代，除南锥地区外，该区域大多数国家的基尼系数开始下降。但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由于外部震荡、衰退和工资份额减少，不平等再度加剧。在非洲南撒哈拉地区，城乡差距一直是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在 1980 年代滞涨或收入下降时期，城市收入的下降比农村收入的下降更大，类似于“平等—下降”的过程。

20. 简言之，Cornia 的研究表明，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全球化加速的时期，所研究的 77 个国家中有 45 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 46.2% 的不平等情况有所增加，有些是持续性的；还有一些，包括美国和中国，则曾呈“U”型。四个国家的不平等情况上升速度放慢；而 16 个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实际改善。这证明，全球化经济中的收入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没有一致或普遍的联系，它受到各国具体情况及政府所执行政策的影响。

### 三、国际援助、贸易自由化和发展权

21. 在国际因素中，除了外国援助，即赠款转让和优惠性资金流入外，国际社会在鼓励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对它们的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作用对实现发展权是至关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从贸易(出口)或外国直接投资中得到的资金流量要比通过外援得到的流量多得多。199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和服务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 1990 年的 26% 增加到 2000 年的近 34%。但是，全球贸易受到高度管制，博弈场很不平等。发展中国家的普通穷人在全球市场上出售商品时所遇到的障碍要比工业国家的普通工人高两倍。在工业国家，仅仅是农业补贴每天就约 10 亿美元，比援助总额多六倍。这些壁垒和补贴使发展中国家因出口机会丧失而造成的费用超过它们每年获得的 560 亿美元。<sup>17</sup>

22. 多数发展中国家国内现有资源不足，优惠性或其它的外国资本流入也不足。官方发展援助的流入大大低于捐助界在各种国际论坛上作的承诺。例如，尽管有一项协议，国际社会(在 1970 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保证达到一项指标，即拨出 0.7% 的国民总产值，作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拨出国民总产值的 0.15% 至 0.2%，作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但是，只有少数国家总算接近了

这一指标。目前工业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每年只达 560 亿美元，仅占它们国民总产值的 0.2%。如果考虑到千年首脑会议上国家首脑作出的承诺，还需要有 400 至 600 亿美元的资金才能支付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的费用。<sup>18</sup> 合起来，这仍然只达经合组织国家国民总产值的约 0.5%。

23. 为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腾出资源的一个重要办法，特别是在极其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是解决它们的债务问题，特别是解决它们欠国际社会的债务。多边机构的减债倡议早在 1996 年提出《重债穷国倡议》时就已提出，这项倡议不同于以前在重新安排官方债务(巴黎俱乐部)和商业债权人(伦敦)偿还日期方面作出的努力。截至 2002 年 7 月，<sup>19</sup> 已为 27 个国家批准了重债穷国倡议下的减债一揽子方案，<sup>20</sup> 大多数国家在非洲；已经提供或者承诺了 415 亿美元以上的援助。这相当于它们所承受负担的近一半。

24. 最初的重债穷国战略受到批评，因为就有关过程的复杂性而言它太慢，而且不足以解决问题，其复杂性表现为：一个国家必须在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下至少通过两项优惠结构调整基金的考验，这就需要六年时间。可承受债务水平的定义也不恰当，起点高(还债与财政收入之比为 25%)，最后是支持它的资金不充足。由于认识到不足之处，并为了向更多的国家提供救济，1999 年对这项倡议作了修订。新方案的核心是国家减贫战略文件中所载的明显地“以增长为导向的战略”，减贫战略文件将直接从国家本身的减贫战略中产生。总的来说，这项倡议虽然从短期至中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其本身并不足以解决阻碍有关国家以权利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的进展的结构制约。

25. 不同区域加速全球化时期的贸易自由化经验不同。以非洲为例，虽然非洲需要扩大进口资本和中间货物以及各种消费品，但进口关税一直很高，平均为 25%，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率的四倍以上。制约非洲扩大进口额的主要因素是为进口融资的资源缺乏，首先是因为非洲出口的增长率一直不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半，而且严重的预算限制只有靠债务减免方案才能消除。主要是由于工业国家对非洲的出口商品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因此非洲占世界出口的份额从 1980 年的 3.9% 下降到 1997 年的 1.5%。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如果消除加拿大、欧洲联盟、日本和美国对非洲出口的所有贸易壁垒，非洲的非石油出口将增加 14%。<sup>21</sup>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常常被援引为贸易自由化中取得增长和减贫的成功例

子。如 Dani Rodrik 所指出，这种成功是由于一项有效的投资促进战略和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而不是由于实行了大规模自由化，这种自由化通常是在这种增长以后实行的。例如，韩国和台湾“保护国内市场以提高利润，实行高额补贴，鼓励它们的公司对外国专利商品进行再设计，提高对外国投资者(当外国公司允许进入时)的进出口平衡要求和国内含量要求等绩效要求。现在，根据世贸组织的协定，所有这些战略均受到严重限制”。<sup>22</sup>

26. 所谓转型经济体的贸易自由化和融入世界市场最为广泛。在 1989 年前，大多数的外贸是在苏联集团内部进行的。东欧外贸只有约 40%，前苏联外贸只有 10% 是与苏联以外的市场经济体进行的。解除国内价格管制、私有化、体制改革和国家对企业的补贴减少，使失业率急剧上升，产出大幅度下降，造成转型的社会代价大量增加。在东欧，实际工资的下降率比产出和就业的下降率还要高，但在前苏联，就业率比收入的下降要缓慢。除前苏联以外的较富裕转型经济体以外，贸易自由化都影响了收入和维持社会保障网的能力。缺乏社会保障网拖延了独立国家共同体(独联体)各国的企业调整，工人继续留在老企业中，接受较低的工资。由于迟迟不能复苏，贫穷日增。

27. 在拉丁美洲，平均关税从 1985 年的 50% 下降到 1996 年的约 10%。在改革前，非关税壁垒影响了 38% 的进口，而到 1996 年，只影响了 6%。但是，非关税壁垒对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各国之间有很大差异。在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工资差距拉大。在墨西哥，外贸自由化后，非熟练工人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大幅度增加。没有稳固确立贸易自由化和贫穷或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总的来说是不平等现象增加了。

#### 四、全球化经济环境中的发展政策

28. 为了制定实现发展权的适当发展政策，就不仅必须考虑到机会，而且要考虑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给国家带来的制约。最近几十年里以市场为主导的全球化的主要制约作用是，它往往有利于原始资产多，对资源的控制力较强的国家，这种情况往往使不平等增加。适当设计经济改革，是可以克服这一制约的，但如果没有这种改革政策，不平等的日益增加将会阻碍发展权的实现。<sup>23 24</sup>

29. 一个国家日益融入以市场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带来的另一大制约因素是，它在决策方面的自主权受到严重限制。原先许多非工业化国家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或者若干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初期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年代可以利用的若干政策选择已不再能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利用。即使在拟订政策前，也必须考虑到它们的政策对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和其他经济体对这些政策的可能反应。

30. 例如，当增加融入意味着外国资本流入的自由化和放宽对国内金融部门的管制以及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些传统手段，如利率、汇率、税率或公共开支等，必须要比以前更加谨慎地使用。将利率提高到世界市场利率以上，可能会引起大量外国资本流入，造成汇率降低，失去国际竞争力，贸易逆差增加等情况。如果这种情况引起对货币是否能坚挺的信任丧失，就可能发生资本外逃的情况，最终的结果也许是金融危机，造成证券市场崩溃和经济衰退，特别是在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管制不充分的情况下。这是 1990 年代下半叶东亚经济危机的普遍经验。但是，如果将利率定在世界市场的水平以下，则可能会立即引发资本外流，并视金融机构的投资组合情况如何而造成危机。或者，考虑采取财政自治政策，为公共投资融资，以刺激增长，或者规定社会部门的发展或保护穷人的社会保障。如果因此而使通货膨胀率上升，则会使穷人的实际收入被重新分配掉；如果它引起对通货膨胀率上升的预测或者对贬值的恐慌，就可能会造成资本外逃，使国内投资减少，引起金融和经济危机。同样，如果将汇率定在 market 所认识到的平衡水平以下，也会引起资本外逃。相反，如果汇率定得太高，经常帐户赤字的增加可能会使得对本国货币价值的信心降低，酿成危机的后患。<sup>25</sup>

31. 显而易见，各国在追求发展目标方面没有统一的政策良方可予遵循。宏观政策手段必须根据某一经济体的具体情况予以设计。此外，各种政策，凡影响到经济业绩各方面的，均必须作为一揽子方案或者一项改革方案予以一起实施，使它们在取得发展成果的过程中相互补充。

32. 实际上，在 1990 年代，宏观经济危机将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推向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例如，它们被迫以结构调整的名义，将若干领域的政策结合在一起，采取了综合性的改革方案，而不是单单根据货币基金组织以前的方案采取的办法解决财政不平衡和贸易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这些国家融入世界经济过程的开始，这一过程很快就遍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各国的项

目在细节方面可有不同：有些是要减税。另一些则要增税；有些要降低实际工资，另一些则要让实际工资增加。但在总的政策方面，它们都兼有汇率调整、公共开支削减、减税但扩大征税基础的税务改革、外贸和投资自由化、取消价格管制和放松对金融系统的管制等。这些政策基本上是这一所谓的《华盛顿协商一致意见》所含的政策。

33. 到目前为止已有大量文献批评上述结构调整政策。<sup>26</sup> 试图根据经验评估这些方案对采取上述政策的国家的经济业绩的影响(不管是在经济增长、减贫方面，还是在改善财政平衡或外贸收支平衡方面)均没有得出明确的结果，因为要在许多不同时期变化不同的变数之间确定因果关系，同时又不陷入先在为因的谬误，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根据货币基金组织的职员和一些外部专家进行的一些研究，包括 Botchwey 的报告，<sup>27</sup> 可以认为，虽然这些方案或政策的内容可能不会引起反对，但它们的结果主要是要看是否能适当设计，并按顺序作出必要的体制安排，以解决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的人的问题。例如，在有些赤字高的国家，当在采取稳定政策之前放宽金融管制时，利率猛长，使私人投资减少，政府的利息负担增加，财政赤字上升。在有些国家，资本帐户的转换和利率的自由化在通货膨胀率降低之前就已开始。价格急剧上涨，除了引起对通货膨胀上升的进一步猜测外，还减少了政府收入的实际价值；政府要减少公共开支，因此社会发展方案全部中断。

34. 有时，一个经济体应在自由化之前开始结构改革。取消价格管制或取消投入补贴，会使若干产品的价格上涨，但不会导致生产多样化，除非结构改革已经使运输网有所扩大，并提供了获得信贷和扩大市场的体制支持。同样，贸易自由化最终也许是非常有益的，但必须分阶段逐步进行，特别是当新的出口行业对供应的反应显著小于原来受保护的行业的收缩时。

35. 对这种调整政策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大多数方案过分强调财政削减，导致若干项政府开支的削减，特别是在保健、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sup>28</sup> 虽然也许不能肯定这种开支的削减会使社会指标恶化，贫穷增加或者经济增长率减少，但由于这些经济体中存在着其他严重的扭曲情况，因此对任何促进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方案来说，均必须规定在国家发展初期要有效、低成本高效益地提高公共开支。实际上上述公共开支的增加必须是任何实现发展权计划的基石。

36.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制定和执行上述宏观经济政策普遍提供指导，而世贸组织目前正在制定和监督实行关于国际贸易的规则。这些规则比以前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更加全面严格，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自主权实行若干限制。较早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今天的工业化国家在其相应的发展阶段一样，实行关税、配额和部门特别补贴，在战略上建立起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自己的工业。它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做了，也不能通过补贴信贷分配或外汇来提高出口部门的利润，因为必须对所有部门的进口和出口实行同样的实际汇率。在国内市场上给予出口商以垄断地位，会招致反倾销诉讼。世贸组织知识产权制度可能会限制一国技术能力的发展，增加生产过程中技术密集型投入的成本。提议的投资多边协定也会削弱发展中国家与多边机构讨价还价的能力。<sup>29</sup>

37. 实际上，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倾向于将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拉平，而国际价格是外部强加给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遵从这一游戏规则，发展中国家就会在影响相对价格，从而影响国内资源分配的微观经济政策方面会失去很大的回旋余地。税务政策的作用也会受到限制，因为广泛采用这些规则，相对于国际价格而言，就会扭曲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这就是为什么多数情况下税务改革方案是调整政策的一部分，总的趋势是降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税率。因此，采取融入世界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采取降低汇率、改变利率和限制工资的宏观经济政策，而所有这些均受到世界市场发展情况的制约。这些国家仍可在某种程度上灵活运用的唯一手段是公共开支，但这必须适当提供资金。可利用公共开支促进私人投资，促进对不吸引私人投资的教育、保健、农村发展和基础设施的社会投资，建立社会安全网。但是，融资问题(降低可承受公共开支赤字和税收支撑能力，特别在当进口关税全面削减的情况下)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下会对这种公共开支数额产生限制作用。

## 五、结论和建议

38. 根据对最近加速全球化时期国际发展状况的影响的讨论，可强调下述结论。第一，全球化和融入世界经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机会总的来说没有使享有发展权的情况改善。这项权利意味着有一个发展过程，伴随着参与性、公平和公

正的经济增长过程，逐渐实现所有公认的人权。它必须按照人权准则和法律实现人的发展。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并非总是能导致经济增长，即使实现了经济增长，也未带来更多的平等和社会正义，甚至也不总是能减轻贫穷这一最严重的剥夺人权形式。这一过程与促进人的发展没有必然联系，这种发展如果以权利为基础，可以被看作实现发展权的一种反映。

39. 第二，上述情况没有发生，因为很少有适当的实现发展权的政策。从发展权角度看问题并不否认全球化及市场力量、贸易和投资流动的相关自由化能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实际上，在扩大生产、消费和可持续发展的范围方面增加潜力，应能够推动发展权的实现。利用了这些机会并加快了经济增长，甚至使贫穷减轻的一些国家清楚地表明了它们是如何在对政策和体制框架作了某些改进的情况下在实现发展权方面取得很大进展的。另外一些国家的经验也表明，政策错误可能是有些权利的实现不充分的原因之一。我们获得的一个明显教益是，全球化本身或只是全球化并不能带来发展权所包含的各种权利的实现。

40. 第三，在制订和执行适当政策时，目标应明确定为实现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贸易自由化、解除管制或全球化本身等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这一目的的手段。因此，它们可以互换位置，可以按时间排定顺序和分阶段实行，还可以用早期的政策予以辅助。但是安排顺序并不等于反其道而行，必须注意不要采取扭曲办法，因而抵消这些政策的好处。例如，贸易自由化意味着使国内和国际价格更均衡，安排顺序和分阶段进行都不是重新实行任何意义上的保护主义。<sup>30</sup> 同样，不能因为解除对市场力量的管制而增加对市场力量的干预和扭曲，因为解除管制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可能不会奏效。辅助政策必须能加强解除管制，从而产生预期的效果。

41. 第四，如独立专家在其前面的报告中所详细阐述，实现发展权意味着履行国家、国际社会和其他机构执行适当发展政策的义务。这种政策必须与它们所适用的具体情况相联系；它们必须在全球化的框架内服从这种框架的约束，以取得最大利益，同时不与这种进程抵触。选择脱离全球化，等于放弃这些机会，肯定不如服从约束和最大程度实现发展权的政策。

42. 第五，要求从发展权角度看问题是因为这样可以制订和执行一种发展政策，这种政策将有助于在服从全球化进程的约束和最大限度利用所提供机会的同

时实现发展权。这种政策应该立足于由实现各项权利(食物、保健、卫生、工作、社会保障等等)的不同政策与实现可持续和参与性的平等经济增长的政策组成的协调方案。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调整政策和经济改革的经验清楚地证明了以实现不同目标的不同政策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关系为基础的发展权政策的基本道理。

43. 从发展权角度看问题的办法明显要求承担责任者，特别是国际社会各国履行义务。在一个国家落实发展权利时，国际社会协助落实的义务便是至关重要的了。首先，各国必须确保尽快消除本国内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的保护主义壁垒。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 Nick Stern 在提出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市场准入的研究报告<sup>31</sup> 时所说：“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是富国在大力解决全球贫穷方面可以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既鼓励穷国开放市场，却又迎合富国强大的特殊利益而实行保护措施，这样做很虚伪。富国应作出榜样”。

44. 在以下几段中，独立专家概述了研究报告所指出需要克服的一些壁垒，特别是在商品贸易、纺织品和服装以及农产品方面的壁垒：

- (a) 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取消商品贸易壁垒中获得的利益每年在 2,500 亿美元至 6,200 亿美元之间，其中约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由发展中国家所获。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因全球减少保护而引起的较快速增长，可以在 2015 年前使生活贫穷的人数减少 13%；
- (b) 加拿大、欧洲联盟、日本和美国的关税细目的 6%至 14%受到“关税高峰”的影响。在加拿大和美国，关税高峰集中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在欧盟和日本，关税高峰集中在农业、食品和鞋类方面。这种保护格局对正在技术上更上一个台阶的国家造成障碍。这些关税的影响由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农业补贴而更形恶化(使世界商品价格低迷，使其更不稳定)，这些国家维持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配额，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实行高壁垒；
- (c) 世界上约有四分之三的穷人仍然生活在乡村地区，在向经合组织的农业出口方面，他们所遇到的关税比经合组织国家间的普通出口(所有产品)高出十倍以上，包括补贴在内，经合组织的农业在 2001 年得到的资助达 310 亿美元，即占国内总产值的 1.3%。这项资助的大部分

随着产值的增加而增加，助长了过度生产，与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在市场上竞争；

- (d) 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自由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贸易带来长期的动态影响。仅仅每年的静态收益就将约达 300 亿美元的收入，1200 亿美元的出口；
- (e) 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纺织品出口的约 50%，占世界服装出口的约 70%。一些国家形成了对这些出口的高度依赖。在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税壁垒远远高过对其他制成品的壁垒。尽管有一项国际协议要求分阶段取消对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配额，但绝大多数配额仍然存在。加拿大、欧盟和美国在取消配额之后又重新恢复，将在 2005 年初执行期结束时造成大幅度调整的压力，因为配额保护了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力不足的供应商；
- (f) 在发展中国家，对劳动力密集型商品出口的壁垒使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放慢。据估计，工业国家对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限制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创造 2000 万以上的就业岗位，其中许多意味着向摆脱农村贫穷迈出一步；
- (g) 调整措施近年来越来越常用，发展中国家日益积极。这种趋势可能会随着法定保护的减少而加强。此外，技术壁垒(包括卫生、安全和产品标准)也在快速增加，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面临这种壁垒的复杂性和成本时准备不足；
- (h)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能通过普遍优惠制(普惠制)以优惠条件进入工业国家市场，但获得的利益常常有限。“敏感”产品的优惠幅度较小，这种产品受到的保护最大。普惠制的利用率较低，部分是由于限制性的原产地规则或者社会和环境要求。

45. 除了采取措施克服上述缺陷外，还必须仔细研究世贸组织和其他贸易安排(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涉贸知识产权问题)、《贸易服务总协定》和《投资多边协议》以及穷国特殊和优惠待遇“保障”和争端解决机制)的运作情况，以促进贸易和自由化政策实现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为此必须设立一个由专业人员以及世贸组织和人权委员会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如果这样决定，本独立专家将

乐意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个见解文件，供工作组审议，以帮助讨论走出倡议阶段，最终提出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

46. 各国的责任是根据本独立专家前几份报告中的讨论拟订发展政策的计划或方案。计划开头，可以在收入和能力方面论述减贫问题，并将目标对准实现一个国家可以在不侵犯其他权利的情况下优先重视的某些权利。但是，计划应在可持续经济发展，减少不平等和加强社会正义的框架内制定这些政策。

47. 除了宏观经济政策、税务改革、市场改革和辅助性的体制改革的各种要素以外，最重要的政策手段很可能是公共投资和开支。在没有将私人投资挤出去的情况下，这些手段的目标应该是将国内外投资输送和吸引到影响大多数穷人生活的部门和领域，必要时予以补充，因为这些穷人的收入和能力必须以可持续的方式予以提高，办法是使他们能够充分有效地参加生产。此外这种公共支出应对那些照顾到可能受到上述改革不利影响的弱势人口的政策作补充。这些社会安全网应配之以使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的措施。

#### 框 1 — 发展权 — 发展协约的四个基本要素

**发展权 — 发展协约模式的四个基本实施要素：**

**基于权利的发展方案** — 这是一种协调各种政策的发展办法，以逐渐实现所有人权以及平等和公正的经济增长进程。它以权利为基础，这意味着是一个平等、不歧视、参与、负责和透明的过程。

**减贫和社会指标目标** — 这是一种确定监督各项权利实现情况的适当指标和基准的制度以及评估各项指标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

**发展协约** — 发展协约是一种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承认“义务的相互性”的机制，以便使发展中国家执行这些基于权利的方案义务与国际社会合作促进方案执行的相互义务挂钩。

**监督机制** — 监督发展权的机制必须个别或综合地评估各项权利的落实情况。发展协约是一项提议的国际文书(独立于条约机构外)，以促进发展权的落实和对具体措施的融资。

48. 为满足基于权利的办法的要求，这些政策必须通过良好施政、问责制和透明以及增强受益者的权利，特别是妇女和受歧视的人的权利，在一个参与性的发展过程中予以执行。独立专家已提出建议，通过一项发展协约来完成这项工作的全部，从而在发展中国家拟订这种方案和努力忠实地予以执行时，国际社会能接受与该国外合作的义务，提供对促进该国执行方案可能必需的所有援助和政策。例如，如果增加公共开支被认为是执行方案的主要手段，那么国际社会应该确保予以充分融资。如果对减贫战略作了适当调整，以实现发展权，那么国际社会应准备增加金融机构的资金流量，以充分落实这些方案。如果一国通过了经济改革或调整方案，以在落实发展权的框架内融入世界经济，那么国际社会应负责减少对该国的贸易障碍，债务和金融重组问题。

### 注

<sup>1</sup> 第一次报告：E/CN.4/1999/WG.18/2；第二次报告：A/55/306；第三次报告：E/CN.4/2001/WG.18/2；第四次报告：E/CN.4/2002/WG.18/2；第五次报告：E/CN.4/2002/WG.18/6。这些报告可在网址 <http://www.unhchr.ch/html/menu2/7/b/mdev.htm> 查阅。

<sup>2</sup> 它主要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认的文书所规定权利。

<sup>3</sup> 增长要推动实现所有作为组成部分的权利，并以权利为基础或者符合人权准则，就必须公平、不歧视、参与性，并以负责和透明的方式实行。将这种基于权利的经济增长进程作为发展权矢量的一个要素列入，其理由已在第五次报告中叙述过。由于实现任何权利均必须要增加实现权利所必须的某些商品或服务的供应量，并通过公共供应和政策行动改善公平和不歧视地获得这些商品或服务的情况。公共供应和政策行动都使用资源，在不侵犯任何权利的情况下可持续地实现所有权利，需要扩大这些资源或者实现经济增长，实现这种经济增长本身必须符合人权标准。这种意义上的发展权是一种与基于权利的经济增长过程同时开展分阶段实现各种权利的过程的权利。

<sup>4</sup> 1986年《发展权利宣言》第3条第3款规定：“各国在确保发展和消除发展的障碍方面相互合作。各国在实现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应着眼于促进基于主权平等、相互依赖、各国互利与合作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激励遵守和实现人权”。

<sup>5</sup> Guy s. Goodwin-Gill, “Obligations of Conduct and Result”, in Philip Alston and Katarina Tomasevski(eds.), *The Right to Food*,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1985, pp.111-118.

<sup>6</sup> See Amartya Sen, “The Right Not to Be Hungry”, in Philip Alston and Katarina Tomasevski(eds.), *The Right to Food*, SIM, The Netherlands, 1984.

<sup>7</sup> 见贸发会议 1999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世界银行 1999 年《世界发展报告》、货币基金组织 1999 年《世界经济展望》。

<sup>8</sup> Servass Storm and C.W.M.Naastepad,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ssays in Honour of J. George Wardensburg*, Edward Elgar,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2002.

<sup>9</sup> 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东亚，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贫穷平均减少 3%，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减少 1% 多一点，但拉丁美洲则不到 1%。Oxfam International, “Growth with equity: an agenda for poverty reduction”, 1997.

<sup>10</sup> 关于这个问题有大量著名的理论文献。但是，对政策在动态平衡的结构里的重要性作出最精彩论述的，可以说是最近出版的由已故著名经济学家 Sukhamoy Chakravarty 教授 1990 年 4 月在伊拉兹马斯作的关于途径依赖性的演讲。[在 Storm and Naastepad 中出版，同上]他发展了 Ragner Frisch 关于动态系统的基本提法，即平衡的前提是，对任何动荡的调整过程会受到沉重的阻滞，然后很快达成一种新的平衡，不管为这种调整花了多少时间。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即使在一种稳定的动态系统中，这种调整受到阻滞的速度很慢，因此，过程中的事件影响最后结果。Chakravarty 认为，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为了应对外来新情况，既不保持一种平衡，也不打破平衡。但它靠随时改变结构而生存。新的结构是否稳定，取决于采取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初始条件，或者说它是“途径依赖的”。这种“途径依赖”将政府的普遍最优化干预排除在外。考虑到一国的初始条件和以前形成这些条件的历史，将在达到这些结果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这可以说是一个走廊，从中选择“最佳”做法。简言之，根据各国的发展、体制和历史情况，同样的外部动荡可能会使各国采取不同的调整政策。因此，对此作出的对策必须是不同的，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sup>11</sup> Dani Rodrik,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rade as if Development Really Mattered*, John o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July 2001.

<sup>12</sup> Jeffrey Sachs and Andrew Warner,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ies*, 1995.

<sup>13</sup> Edward 的研究也表明，贸易扭曲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较低，这种结果对形成国家的发展政策有很大影响。在此可以提醒注意的是，从发展权角度看问题的办法要求，一国的总体经济政策必须根据发展和经济增长进程与实现各项权利的政策相协调。在这些政策中，在实现发展权的框架中受欢迎的是那些对贸易的扭曲程度最低的政策。

<sup>14</sup> Rodrik, 同上。

<sup>15</sup> 关于以前的一份研究报告，见 Klaus Deininger and Lyn Squire, “A New data set 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10, No.3, 1996。

<sup>16</sup> G.A.Cornia, “Liber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WIDER), working paper No.157, March 1999。

<sup>17</sup> 开发署，2002年《人的发展报告》。

<sup>18</sup> 同上。

<sup>19</sup> HIPC Initiative: Status of Country Cases Considered under the Initiative, July 2002 at: [www.worldbank.org/hipc/progress-to-date](http://www.worldbank.org/hipc/progress-to-date)。

<sup>20</sup> 就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情况发表了一份重债穷国问题初步文件。

<sup>21</sup> 2001年《全球贫穷情况报告》，由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和各区域发展小组为2001年7月的八国集团热那亚首脑会议编写。

<sup>22</sup> Rodrik, 同上。

<sup>23</sup> 这种限制的存在与基尼系数所观察到的偶发性统计和长期稳定相一致，因为家庭调查数据，即使可靠的话，通常也有时间间隔的。此外，如果全球化在初期阶段只影响到在边缘的人，从而使全国的不平等状况达到平衡数，或者如果补充政策或社会保护机制能抵偿日益恶化的结果分布情况，那么所观察到的基尼系数可能变化不会如此大。

<sup>24</sup> 有一个前提，根据 Stolper-Samuelson 定理，贸易自由化将收入移位到国内充足的要素上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意味着通过贸易自由化增加全球化，主要使充足的非熟练劳动力受益，改善收入分配。但是，大量的经验性研究查明了与此相反的许多例子。Daniel Robbins 对拉丁美洲和东亚七个国家的综合研究(“拉丁美洲或亚洲的贸易、贸易自由化和不平等——七个国家的研究综合”，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1996年3月)表明，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中，熟练劳动力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在全球化以后提高的原因是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有相对大的增加。对墨西哥贸易自由化的研究表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相对于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实际上有所下降。所有这些对 Stolper-Samuelson 的提法来说是反直觉的，为解释这种所谓的不正常现象而建立了若干理论模式。例如见 Donald R.Davi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mimeo),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sup>25</sup> 所有这一切，见 Storm and Naastepad, 同上。

<sup>26</sup> 例如见 Paul Collier 和 J.W.Gunning, “货币基金组织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经济日报》，1999年11月，根据《为评估扩充的结构调整贷款办法的若干方面而任命的独立专家组报告》(《Botchwey 报告》)，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

<sup>27</sup> 同上。

<sup>28</sup> 虽然有许多研究表明方案的这种特点，但最全面的一项研究是 A.Comea、R.Jolly 和 F.Stewart 所作，*Adjustment with a Human Face: Protecting the Vulnerable and Promoting Growth*, Oxford, 1987。

<sup>29</sup> 见 Storm and Nasstepad, 同上。

<sup>30</sup> 关于如何不使在不违反贸易自由化原则的情况下消除国内扭曲的政策混淆在一起的问题有一整套的文献。这项工作于 1960 年代由著名经济学家 Jagdish Bhagwati 发起。在近期，在关于“联系”的辩论中援引了关于对一个具体目标采用一项正确政策的原则。例如见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January 2002,especially articles by David W.Leebron and Jagdish Bhagwati。

<sup>31</sup>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市场准入—若干问题》，2002 年 9 月。可在下列网址查阅：<http://www.worldbank.org/annualmeetings/mktaccess.pdf>。

-- -- -- -- --